

基辛格

一个智者的画像

〔美〕斯蒂芬·R·格劳巴德著

6365

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 辛 格

一个智者的画像

〔美〕斯蒂芬·R·格劳巴德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tephen R. Graubard

KISSINGER

PORTRAIT OF A MIND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诺顿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基 辛 格

一个智者的画像

【美】斯蒂芬·R·格劳巴德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7,000

1974 年 11 月第 1 版 197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3171·167 定价: 0.9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是一本介绍基辛格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思想的书。

作者斯蒂芬·R·格劳巴德是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刊物《第答勒斯》的编辑和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成员。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他就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他和基辛格一起在《合流》杂志担任过助理编辑，并都曾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班执教。

作者在本书中企图通过概述基辛格的哈佛毕业论文和几本主要著作的要点，阐释基辛格对国际形势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主要观点。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基辛格外交和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方面，多少有些参考价值。但不论是作者或是基辛格本人，他们的立场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如谈及美帝侵朝战争时，胡说这场战争“之所以结束，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实在不能再投入更多的力量了”，竭力掩饰美帝在朝鲜战场上被朝、中两国人民打得落花流水、被迫停战的实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则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污蔑我国人民在中印边境的自卫还击是什么对印度的“侵略”，公然为印度反动派张目。诸如此类妄言谬说，希望读者注意批判。

作者除了介绍基辛格的思想以外，也描述了“促使基

辛格发迹的环境”，提供了基辛格生平中一些“独特的和值得注意的方面”。例如：陆军教官克雷默、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对他的影响；纳尔逊·洛克菲勒如何“重视基辛格的忠诚及友谊”；基辛格和尼克松、施莱辛格等人的关系。这些材料透露出了基辛格的战略理论代表着美国统治集团，特别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意向。

基辛格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所谓“探求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推行“均势”外交，也就是要美国以实力为基础，“在军事上两极化而在政治上多极化的世界上”，纵横捭阖，“多极”平衡，以便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挽回颓势，继续称霸全球。“尼克松主义”就是这种战略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的出笼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霸权地位急剧衰落的窘境，以及根据美国垄断财团的利益而进行的全球战略部署的调整。然而，基辛格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垄断财团的谋士，尽管他煞费心机为美国垄断财团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但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究不能使他找到一种挽回资本主义制度衰落的万应灵药，“灵活反应”也罢，“均势”外交也罢，充其量只能使美帝国主义苟延残喘于一时，而绝对拯救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不断受到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股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奔腾向前，势不可挡！

1974年4月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4
一 早年·····	16
二 论梅特涅与卡斯尔雷·····	31
三 论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83
四 艾森豪威尔年代·····	154
五 肯尼迪—约翰逊年代·····	226
六 约翰逊年代·····	286
七 洛克菲勒 1968 年的竞选运动 ·····	308
跋·····	342
基辛格著作目录·····	351

序 言

美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在政府高级职位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基辛格的经历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非同寻常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绝大部分的成年生活消磨在大学里，思考和著文论述外交事务，评论那些积极负责制订美国政策的人的功过，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意见；他是一个学者，可是他从来没有满足于完全在学院圈子里生活，也不满足于按照学院的规矩生活，他认为从外界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经验，而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他是一个欧洲人——对于传统和历史很敏感，能够忍受可能产生的悲剧——但又是一个美国人，他固然能察觉到某种形式的权力，但对于道德问题往往也并非毫不在意。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参加尼克松政府以后的所作所为上，却很少有人想探讨他在进入华盛顿以前所提出的那些建议。本书则立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主张，即认为基辛格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写的文章同1969年1月20日以来他所做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反映他的思想的文章是公开发表的，谁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行动却只有一部分为公众所知，如果要完全透露出来，还须等到许多年以后。这样，我认为，查阅现有材料就显得更加紧要了。

我的目的不是想写一本亨利·基辛格的传记。虽然我毫不怀疑这样一本传记将会在许多方面引起巨大的兴趣，但是我并不相信这样一本传记对于那些我认为现在是至关重要的目标能起什么作用。我按照自己的路子写了这本关于基辛格的书，不是因为

对他了解较多,出于友谊关系宁愿少谈一些,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所讨论的内容对于了解这个人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兴趣在于解释他所主张的论点,并经常引用他自己的话来加以解释。在下面的正文里,我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基辛格在担任公职以前撰写及发表过的一切著作。我不想把他的著作与他的同事们的著作进行比较;别人也许希望这样去做。不过,我力图稍稍介绍那些造就他的学校,那些与他有重大关系的人物,那些使他有可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获得知识的事件以及那种使他的出任公职成为可以想见的经历。我确信,如果他没有得到别人的鼓励和支持,也许不会这样发迹,但是,我们如果不高度重视他的思想,也不可能了解他的生平。

基辛格象戴高乐一样,也许始终相信自己的命运,而他所接受的美国教育几乎一定会教他懂得绝对不要公开表明这一点。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为美国人写作,并且非常自觉地力图用热核时代国际关系和决策的原理指导他们。反过来,他在美国的生活经验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他这样一个人。基辛格的经历——不仅仅是从1969年1月20日开始的那段经历——就是美国人可能有所作为的明证。可是这不是一个霍雷肖·阿尔杰^①的故事,基辛格完全是二十世纪的美国造就出来的。

我很感谢许多人帮我写成这本书。当然不消说,他们谁也不用为本书的任何部分承担责任。我感谢小格雷厄姆·艾利森、吉诺·巴洛蒂、弗朗索瓦·布里科德及马丁·迈耶森阅读原稿和提出有益的批评。他们都知道我为此多么地感激不尽。对于听过本章或那章的内容或同我讨论过原稿以及了解基辛格的其他朋友们,我也铭感不忘;其中特别应当提及的是埃莱娜·当德洛、约翰·康韦、吉尔·康韦、伊丽莎白·爱泼斯坦、斯坦利·霍夫曼和埃里克·韦尔。丹尼尔·贝尔、埃莉诺·法勒、杰拉尔德·霍尔顿、希

①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西方资产阶级吹捧他是完全依靠个人奋斗而发迹的。——译者

尔达·德罗思柴尔德和彼得·沃尔康斯基最了解我所努力从事的工作，从其他方面鼓励我。本书中讲到的人有不少同我本人很熟悉；有一个时期或在平时，我曾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谈论过基辛格。由于这本书从来没有打算写成传记，所以我想就不用一一去拜访他们了；不过有好几次我曾感到需要这么做。我还要向威廉·埃利奥特、卡里尔·哈斯金斯、弗里茨·克雷默、赫伯特·马科维奇和纳尔逊·洛克菲勒致以谢意。最后要向我的秘书邦妮·哈利斯申谢，她欣然负责为我多次整理原稿，并且愉快地和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对我帮助很大。本书的出版人唐纳德·拉姆向我提出过极有助益的意见，我也要向他表示谢忱。

斯蒂芬·R·格劳巴德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引言

唯有能正视亨利·基辛格生活中的嘲弄和矛盾的人，才能理解他的生平。这个被认为是很神秘的人从来不隐讳他的观点；几乎在每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里都可找到他的观点。这个凭着智慧和口才发迹的人，在进入华盛顿，在理查德·尼克松手下工作之前许多年，就懂得每个人的权力总是有限的。要是历史没有教他懂得这一点，那末，他在观察肯尼迪政府的体验中，也会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教训。他为自己当上了一个学者而洋洋得意——这个成就也许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但他觉得这样的成就还不能使他感到最后的满足。他从版税通知单中知道他的著作极为畅销；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相信他的许多理论对于那些他最希望施加影响的人来说，都是情投意合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人物——既是欧洲迫害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又是美国千载难逢的种种机会的一个受惠者——基辛格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个追求旧时代荣华的人。有些人说，要是基辛格生在他曾著述过的梅特涅^①或俾斯麦^②的时代，他也许会更幸运些。要是基辛格发表了他在大学本科时所写的关于伯里克利时期^③的一些随感，那末在这些

①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后并兼首相。十九世纪前期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译者

②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他曾推行所谓“铁血政策”，通过几场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译者

③ 伯里克利是公元前443—429年间雅典的最高领导者。希腊历史上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为伯里克利时期。马克思曾指出这是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译者

人中间有些人就禁不住会称他是当代的雅典人了。他们只有在不愿意用这种称呼赞美他的时候才会忍住不说。当人们称基辛格是一个梅特涅式的人物或者俾斯麦式的人物时，丝毫没有褒美的意思。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大大地使他获得了神秘人物的名声；他认为既不必去同那些存心中伤他的人争论，更不必去反对这种旨在恭维他的性格刻划。事实上，真相是相当复杂的；可是要揭露真相，就得了解他这个人，尤其是了解他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在他的几本大部头著作里比比皆是；在所有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他的思想在这些著作里都有忠实的反映。说它们为他的思想描绘了一幅画像，也决不会言过其实。因此，这些著作对任何一个肯耐心钻研的人来说，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基辛格成年以后全力以赴地从事写作。写作活动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消耗了他最大部分的一直很充沛的精力，但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基辛格认真地推敲自己的原稿，从最初的一份写在大张纸头上的字迹潦草的手稿开始，末了是以一份在朋友中辗转传阅，经过三四次修改而最后修订的打字稿结束。凡是看到过基辛格这样做的人都认识到，基辛格从来不把写作看成是一件可以轻率从事的普通工作。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得到的成果，谁要查考谁都可以找到。各国外交部和大使馆几乎肯定已经查考过了，但新闻界却不是那样积极。事实上，他们对基辛格的思想特别不感兴趣；实在难得要描述他的思想时，也是写得很刻板、很不确切。已经发表的几百篇有关基辛格的特写、背景资料、传记和新闻故事都是满纸臆测，很少是真正熟悉他的思想的。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他头脑敏捷、才华出众，是近几十年来进入政界的一个最有才能的人。谁都可以想一想，评价一个人的才智，除了阅读他写的书和文章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这些著作毕竟不是一个任性的年青人信笔涂鸦的东西

啊。

在长达十五年的大学生涯中，基辛格写了四本书和数不尽的论文。这些著作，同他从那时到现在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他思想的产物。如果忽视这些著作，或者低估它们作为理解基辛格其人的一种途径的重要性，就表明对他的观点和他的生平都一无所知。从1947年到1968年，基辛格生活在一个大学环境中，起初当学生，后来当教授。当他还未成为研究生时，因为忙于学习，他对哈佛大学不大在意。在他对这所学校有了较多的了解后，他觉得他不那么喜欢哈佛了。他已领略到在这种学院圈子里所特有的种种小心眼儿的恶习气，那里虽说权力微不足道，可是大家都怀有野心。他经常抱怨那些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缺乏雍容大度的作风。当然他也体会到这个学院天地里的乐趣，特别是那种他爱怎样学就可以怎样学的乐趣。他是一所有自信心的大学的一员，又是一门生气勃勃的学科的一员，而这所学校和这门学科又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便利用新的机会。在战略研究这个课题尚未确定名称之前，基辛格就跨进了这个领域，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才得知国内有些专职研究人员把他看作为一个普及推广者——在学术界里这是一个骂人的字眼。虽然有些人在这个课题上确实称得上是有专长的，基辛格与他们相形之下似乎显得浅薄一些，但基辛格从来不想去效法他们。他对自己的做法满怀信心，认为无需去照抄别人的更为深奥的阐述。他也根本不想丢掉他同大学的联系，去换取进入一个研究所的机会，使他不再受到学生的干扰。凡是他受到别人的帮助，他立即表示感谢；这种人往往是象他一样杰出的通才，他们不愿意让狭窄的专业兴趣把自己束缚住。

基辛格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拒绝那种认为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战略方面的想法。就他来说，战略问题是一门范围较广的学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觉得：不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内或是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外，很少有人认为应当在较广泛的知识面中来了解这一领

域，这种情况是很不幸的。基辛格自己的“体系”——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取决于这样一个命题，即在外交、军事战略和内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互关系。由于基辛格认为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开，并且认为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的失败就在于错误地企图这样做，因而他觉得，研究武器系统同研究政府体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就他来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亚于心理学，这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历史观点，即强调选择的可能性，强调需要有一种主义以及强调领导权的集中。

基辛格是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记者；他感到没有义务去评论每一个重大事件或判断每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情况。不过他所关心的事情总是很具体的，这一点就使他把自己的理论同历届政府的特定行动联系起来。于是某些问题就反复地在他的脑际出现：一项特定的政策所依据的总原则是什么？这项政策是怎样被采纳的？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为什么觉得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多？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一些办法？基辛格的思想方法把他引向历史研究中去，但他从不以一个历史学家自居；他所关心的绝大部分都是现状，但他主要是把现状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指示在将来也会出现同样情况的可能性。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写的作品，是他对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这三个总统的外交政策的得失所作的连续的评述。这三个总统，如果有谁读了基辛格的这些著作的话，都不会对基辛格所作的判断感到特别高兴。关于约翰逊，基辛格实际上是保持缄默的。这种缄默也许是他最厉害的判决。要是基辛格在参加尼克松政府之前没有写出他的某些文章和专著，那末它们也许永远不会写出来。因为基辛格写文章决不光是为了直率地记录事实，他所关心的总是对政策施加影响。当他挑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过错时，他就提供另一种政策；当肯尼迪政府尽管进行了狂热的活动和广泛的宣传，但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成效

极微时，他表示了他的保留意见，并且指出了当时未被采用的可供选择的对策。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公众可以了解的一部分事实；如果人们需要了解基辛格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其他任何一个美国领袖的想法，既不需查阅私人信件，也不用找绝密文件。事实上，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兴趣，所有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到基辛格写的关于两位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家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文章上去了。常常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有些人忽视某一些作品而偏爱另一些；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所以特别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许多人专爱描述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政治家才能的看法，而对基辛格实际上所讲的，却只懂得一点皮毛。对于为什么基辛格被看作是“喜欢”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以及为什么这两个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现在流传着一些糊涂的说法。基辛格的一部有三百五十页的论述梅特涅的著作，包含了不少很难懂的段落，并且要求读者至少得有一点历史兴趣，这本书之所以始终没有被人们仔仔细细地读完过，其原因也许可以用怠惰来解释；但怠惰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人没有读过这本著作却想在这本著作上舞文弄墨。至于基辛格对俾斯麦的看法，即使是怠惰，也不能为上述这些疏忽作辩护。基辛格对这个普鲁士领袖如何看法早已公开发表，只要把一篇三十五页的论文稍稍浏览一下，就可得知他的见解了。

那末，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曲解呢？这是因为许多用梅特涅式人物和俾斯麦式人物这类字眼来解释基辛格观点的人，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不感兴趣，他们仅仅关心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为之服务的总统的政治活动。他们就象政治小册子作者一样写作；当他们使用诸如“现实政治”这种稍微含有贬义的名词时，他们想说明基辛格同十九世纪统治德国和奥地利的“反动独裁者”在思想意识上很接近。关于基辛格本人对俾斯麦的政策表示过严重保留意见这一事实，他们竟不屑一顾；他们偏偏喜欢把基辛格刻划成俾斯麦的

门徒,甚至是他的继承人。至于梅特涅,他们似乎要问,人们何必在基辛格那些迂回曲折的议论上去自寻烦恼呢?只要把基辛格拉到梅特涅的旗帜之下,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免掉不少麻烦了。要是你知道基辛格是如何描绘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你不妨对那些假装熟悉基辛格的著作而又不愿阅读他的作品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试试看。完全忽视这个主题的倾向现在占压倒优势。也许这样并没有什么损失,卡斯尔雷从没有成为使美国人害怕的妖魔,他只是表面上同真正的恶魔梅特涅和俾斯麦相象而已,除此以外,他要当一个德国人甚至还不够格哩!

本来,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曲解详谈细论,要不是它们在基辛格对十九世纪外交,特别是对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那样的政治家发生兴趣的性质上反映出一种根本性误解的话。基辛格研究这两个人并不是象十九世纪的小学生研读普卢塔奇^①的《名人传》那样,幻想他能够从中找到值得效法的模范。如果基辛格竟然想象效法梅特涅或俾传麦是可取的或者是可能的,那末他就确实太天真了。基辛格研究他们的生平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对采用他们的方法发生兴趣。他研究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使他眼界开阔起来,从而使他能够更加有效地考察他自己这个时代的问题。基辛格所关心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由于出现了热核武器而引起的种种问题。

奇怪的是,在那些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是神话般的欧洲大人物上已浪费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而却没有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努力来研究基辛格如何评价当代的活跃人物,如邱吉尔和戴高乐、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大量的证据说明,很少有人知道基辛格曾经写过关于这些人物的文章。基辛格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独具慧眼的,他对他们的优缺点的评价迥然不同

① 普卢塔奇是公元120年希腊的传记作家。——译者

于许多不得和他们周旋的人，这不过是故事的开端，由于基辛格的著作相对说来并不为人所知，这个故事大部分还没有讲过。

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论或著作，暗示他担任高级职位时可能会干些什么，这是很少见的。今天在美国，对于许多已经全国闻名的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很难作出十分确切的判断。公众大都是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等所传布的消息去了解他们的领导人的情况的；用以评价领导人的依据，往往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如根据别人对他们的议论；根据他们带来的同僚（往往也是一些同他们一样模模糊糊的人物）；根据他们在那些考验他们的表演才能和精力，多于考验他们的品格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即使在少数孤立的情况下，可以从《国会记录》或其他类似地方看出他们似乎持有明确的观点时，也不可能得知人们所读到的东西是一个高明的行政助手的代庖呢，还是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首创者？我们依靠那些勤勉的新闻记者有时描述得有声有色的虚幻的东西过活。一个人在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已经真实地把他的想法见诸文字，并且把这些文字材料放在一个人人都能得而见之的公共场所，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能了解一个社会名流的想法，而且在他当权时又能了解到，这是要具有某种特权的。既然这种情况是如此难得，如果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机会，那就实在太粗鲁了。

然而，就亨利·基辛格而言，这种机会却一直被忽视了。一卷从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里偷出来的文件可能会刺激国内每个记者的胃口；记者们会不辞辛劳地去仔细研读这种材料。就算“机密”文件确实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就算至少有一些材料不仅在帮助说明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思想方面，而且在更广泛地透露了政府的政策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可是试问：专心一致于“机密”资料不是使太多的美国记者而且也使太多的其他人对于公开场合可以见到的浩瀚资料不够注意了呢？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合理吗？

提这个问题不是有意夸张其辞。就亨利·基辛格来说，没有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已经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它使人们对于外交政策永远抱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事情似乎都是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对基辛格的著作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就决不会象以往那样把基辛格本人加以浪漫主义化了。基辛格总是含蓄地或者明白地对个人作用的持久性提出疑问，他知道个人能够 and 必须做到什么程度，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他无能为力的。

如果对基辛格的著作比较熟悉，那末也许可以使别人比较容易地预测近年来外交政策的许多新事物，从而有可能使他们多少带些批判的眼光来考察正在出现的各种“惊人的景象”。新闻报道本身是这样纷至沓来，使人无法袖手旁观，也无法对它进行应有的认真研究。1969年以来，在野人士中没有一个象基辛格那样的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无情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一点也不带有个人私愤。总之，现在在野人士中没有象他自己那样的“基辛格”了，这是对基辛格不利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使人感到遗憾的原因是：人们对基辛格的研究始终是站不住脚的，人云亦云的，当这种研究工作表现友好时，几乎满篇是多情善感之词，或者在表现敌意时，则又充满恶意指责之词，这种研究往往掩盖了对基辛格生平的基本方面一无所知。这两种研究工作中，没有一种研究充分强调基辛格生平那些独特的和值得一提的方面。要是了解这些方面，就会进而解释为什么他的事业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这样的发展。

不妨回忆一下，当战争把他从纽约犹太难民区解放出来，并把他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那时他受的教育是多么平凡。他在陆军服役使他在几个方面都具备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它使基辛格认识了美国，要不然他是不会那么快就认识的；它使基辛格能够在迫使他产生同情心的环境下去看待自己的祖国。他在二十四岁时刚刚开始接受重要的正规教育；世界上不是每一所名牌大学都能